

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概念、特征与政策启示

□凌永辉 □刘志彪

中国基于出口导向战略的全球价值链依附性嵌入模式是在国内供给和需求“双弱”背景下的理性选择,但这却造成了内需和出口之间的结构性背离,从而导致本土企业被锁定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化解这种结构性背离的关键机制,是以动态比较优势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即依靠强大的国内有效需求建立起“以我为主”的全球化产业分工组织机制。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拥有自生能力、强调动态竞争、重视大国优势和较长的产业链延伸四个方面。中国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需要从微观层面培育和企业家精神,从中观层面维护产业平等竞争,从宏观层面优化政府的经济治理体系。

关键词: 内需主导; 全球价值链; 大国优势; 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56(2020)06—0026—09

DOI:10.16158/j.cnki.51-1312/f.2020.06.004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迅速地发展为“世界工厂”,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依靠在出口导向战略下依附性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代工生产模式。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全球价值链的主导企业通常都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而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只能在纺织、服装、制鞋、汽配等初级要素密集型产业进行国际代工。实际上,这种依附性嵌入模式根植于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国内需求和供给的“双弱”国情。首先从国内需求来看,由于收入分配结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缺陷,国内消费需求率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8.1万亿,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2.3%。即便考虑低估的可能性,中国的消费率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普遍80%以上的消费率。国内需求疲弱的直接后果就是形成了“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贸易,中国本土的产业链循环则被严重地阻断。从国内产品供给来看,中国制造业表现出严重的低端产能供给过剩,而在关键零部件生产、核心技术产业占比、产品质量等产业高级化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巨大差距。以钢铁行业为例,在去产能和环保限产的政策调控下,2018年中国粗钢产量突破9亿吨,创历史新高。但是高端钢材依然要依赖大量进口,更不用说一些先进装备制造,这说明中国钢铁行业的产品供给仍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低技术密度的中低端产品。

中国制造业在“双弱”情形下选择依附性嵌入模式的逻辑可以总结为:一方面,由于本土产品的高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城镇体系协调发展研究: 测度、成因与绩效评价”(71873062); 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项研究项目“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转移与区域一体化研究”(2019GXJK091)

作者简介: 凌永辉,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志彪,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质量供给弱于国外产品,如果扩大内需,那么竞争性的替代效应将导致国内需求大量转移至国外的进口产品;另一方面,由于国内需求弱于国外需求,如果本土企业提升产品供给质量,那么该企业的理性抉择就是出口加工贸易。显然,在国内需求和供给“双弱”的情形下,内需和出口形成了结构性背离。这种背离是造成大量的本土企业被牢牢地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关键原因。

那么,如何化解内需与出口之间的结构性背离呢?本文认为,答案就在于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换言之,中国经济要实现自主可控的产业升级和发展,不应该也不可能仅仅依靠外需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上进行简单的国际代工,而必须回归到基于国内需求和本土市场培育,以动态比较优势实现技术和市场的双重追赶,建立起“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在当前经济背景下,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既是为了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需要,更是为了促进国内经济转向消费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为此,本文重点探讨了一些具体问题:一是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概念界定,包括内需和内需主导型战略本身的概念讨论;二是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特征,论述其与传统的全球价值链的区别;三是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政策启示,揭示了在中国情境下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政策着力点。

一、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概念界定

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概念,从词义分解来看,至少包括了三层含义:第一层是内需的含义,第二层是内需主导型(战略)的含义,第三层是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含义。因此,本部分接下来将依次进行分析。

(一)内需的概念

从广义上说,扩大内需应包括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两部分^①。然而,中国的投资率似乎不仅不存在不足,反而存在过高的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投资率长期维持在30%—50%之间,但从国际经验来看,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正常情况下的投资率分别保持在15%—20%和20%—30%的范围。^②如果按照传统的GDP支出法核算原则来测度中国的内需率(即消费与投资两项加总后与GDP之比),不难发现,1978年至2018年的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始终在90%以上(见图1)。因此,从总量角度来看,内需不足似乎是个伪命题。在这种背景下,国内学界有种观点认为,在中国语境下的扩大内需主要指扩大消费需求,而非扩大投资需求。这显然是对中国的内需不足问题的一种狭义理解。实际上,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市场经济大国而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都是支撑中国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在对内需概念的具体理解上,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一个方面是指“对国内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它涉及的是国内产出品与国外产出品的竞争替代问题;另一个方面则是指“来自国内的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涉及的是有效需求来源于国内还是国外的问题^②。具体来看:首先,“对国内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这是从需求客体的角度来考虑的,即国内需求的商品和劳务,要么是由国内生产并供给,要么是由国外生产并供给。显然,它反映了国内产出品与国外产出品之间的竞争替代关系。由于这种从需求客体角度进行的解读,侧重于国民经济的供给面分析^③,且国内产出品与国外产出品之间的竞争替代关系也不是本文主要关心的问题,因而不再进一步展开。其次,“来自国内的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这是从需求主体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要么来自国内市场主体,要么来自国外市场主体,它反映了有效需求主体的国内外差异。在这种经济需求面分析之下,内需直接体现为国内市场主体

^①资料来源:根据Wind数据库相关资料计算。

^②在需求客体的概念意义中,需求仅与产品生产自国内或国外有关,与产品被国内居民使用或国外居民使用无关,这实际上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

的国内消费、国内投资以及进口需求,外需则直接体现为出口。由于国家统计局的指标解释指出,最终消费支出指“常住单位从本国经济领土和国外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因而支出法GDP中的消费需求已包括进口需求。这样,内需就等于消费与投资之和,总需求就等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项的总和。^①按此公式测度的中国内需率平均值,在1978年至1991年间约为91.4%,在1992年至2000年间约为84.2%,在2001年至2008年间约为76.7%,2009年至2018年间约为81.6%(见图1)。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目前学界对内需概念缺乏清晰界定,对中国内需率的测度结果也存在高估。本文基于需求主体视角的内需概念界定表明,内需是指一国或地区的国内市场主体的有效需求,据此测度的结果修正了过去对中国内需率的测度偏误。根据图1,中国内需率在2006年达到最低的72.5%,特别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这段时期,内需率处在较长的历史低位阶段,而且也呈现出较大的波动幅度。这说明,在出口导向战略下快速增长的外需对内需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挤占效应,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很明显的出口依赖特征。但是,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出口呈现长期的疲弱态势,中国经济增长寻求从出口导向到内需导向的战略转变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二)内需主导型战略的概念

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内需主导是与外需主导相对而言的。中国的外需主导主要表现为出口导向型战略,它是基于过去廉价的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利用国外市场发展以“两头在外”为基本特征的(相对)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主要表现为“出口创汇→扩大进口→发展生产→扩大出口”或“利用外资→发展生产→扩大出口→扩大利用外资”等模式^[3]。显然,出口导向型战略忽视了国内市场大循环体系的培育和利用,限制了中国的大国优势的发挥。与出口导向型战略不同,内需主导型战略则是基于大国优势,以国内市场主体的有效需求为导向,将产业升级、资源开发、区域协调等统一到国内市场大循环体系之中。

但必须强调的是,内需主导型战略并不意味着国内市场循环对国际经济循环的替代。因为从功能上说,扩大内需并非是对外需的完全替代^[4];相反,二者存在互补关系。正如Krugman^[5]等新经济地理理论所指出的,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所产生的国内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内需规模较大的国家同时也将是净出口国。也就是说,那些具有国内市场效应的生产部门,将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中产生新的成本优势,从而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也引致了外需。事实上,随着全球化市场分工不断向纵深发展,产品、服务、要素等在国际间的流动极为频繁,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的。因此,扩大内需不等同于“闭关锁国”,内需主导与经济全球化之间并不矛盾。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

^①消费与投资项的数据可以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的支出法GDP统计中直接获得,但出口项的数据只能用国家统计局对外经济贸易统计中的货物出口总额近似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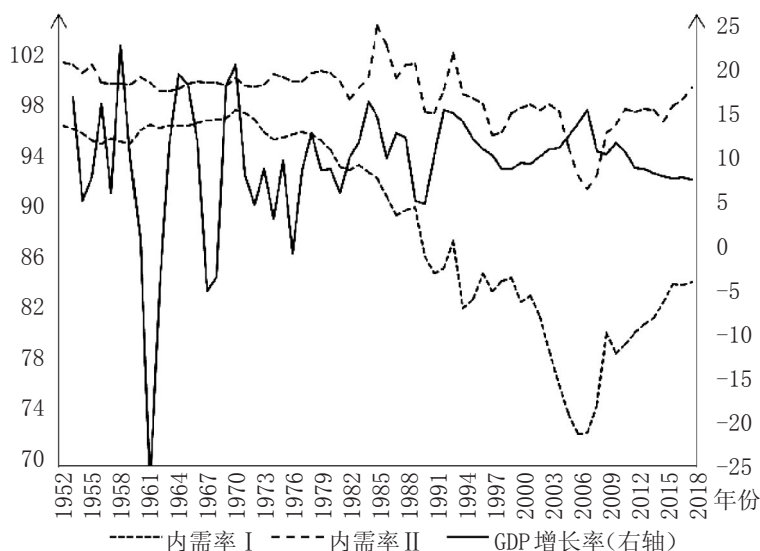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内需率在不同视角下的测度结果对比(单位:%)

注:内需率 I 表示“来自国内的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视角下的内需率,内需率 II 则是传统 GDP 支出法核算视角下的内需率,GDP 增长率是以上年为基期按不变价计算的实际增长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测算并绘制。

经济而言,仅仅靠内部动力走向现代化并不现实,它也需要进一步对外开放,在与外界的交流和碰撞中汲取更多的持续增长动能。

综上,内需主导型战略的本质内涵就是以国内市场主体的有效需求为主导,虹吸国内外优质生产要素为己所用,促进国内产业和经济的创新发展^[2]。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国内人口规模、城市化进程等都无一不显示出巨量的市场潜能。当国内市场主体的这种潜能被激发并形成有效需求时,中国经济完全能够以内需为主导实现创新发展。一方面,大国经济的内需市场具有“规模效应”,能够虹吸全球创新要素在国内形成集聚,既服务于传统制造业升级,也促进现代服务业加速发育。另一方面,大国经济的内需市场还具有“竞争效应”,能够促进产品或服务的多样化和差异化,既有利于契合当前的个性化定制潮流,也有利于避开与发达国家的同质竞争,从而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国际经验已经证明,大国经济体的内需主导型战略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譬如,美国经济在19世纪至20世纪期间的崛起,走的就是一条以内需为主导的发展道路,其特点表现为宏观层面的国内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微观层面的企业存在强烈的内向倾向^[6]。

(三)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概念

Antràs对全球价值链的最新定义指出,全球价值链由生产并销售给消费者的产品或服务所涉及的一系列具有增值作用的阶段所组成,并且至少有两个阶段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7]。可见,全球价值链实际上是国际产业分工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具象表征。因此,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就是在内需主导型战略下,依靠强大的国内有效需求建立起的“以我为主”的全球化产业分工组织机制。其中,强大的国内有效需求是建立起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因素,这表明能够建立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经济体必然是大国。因为只有大国经济才具有规模性、内源性、多元性等特征^[8],这些特征意味着大国经济可以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获得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等国家竞争优势,而这些国家竞争优势是本土企业成长为全球价值链“链主”的重要支撑条件。而且,这种利用国内市场的拓展来实现全球价值链主导和控制地位的经济成长模式,也有利于绕开作为在位者的发达国家所发起的直接挑战和冲突。历史上美国和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崛起过程中,在对英国政治经济霸权所造成的冲击方面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基于国内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对英国霸权造成的冲击相对较小,德国基于海外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对英国霸权造成的冲击却要大得多,甚至由经济竞争恶化为军备竞赛^[9]。

图2绘制了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在实施内需、外需战略下各种可能的全球价值链形式的示意图。从图2中可以看到,第I象限表示大国经济实施内需战略的情形,其全球价值链形式也就是本文所提出的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第II象限表示小国经济实施内需战略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小国经济体普遍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如二战后的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因而全球价值链也就无从谈起^①;第III象限表示小国经济实施外需战略的情形,其全球价值链形式通常是依附性嵌入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如“亚洲四小虎”等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当中^②;第IV象限表示大国经济实施外需战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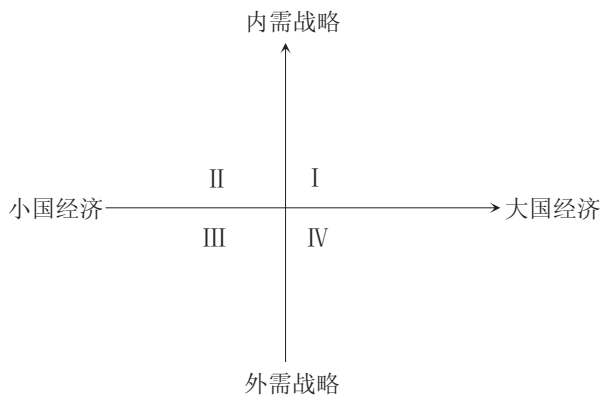


图2 大国、小国经济在内外需策略下的全球价值链类型示意图

^①尽管在内需主导型战略下,这些小国经济体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国外要素和资源,如计算机、精密机床等仍依靠进口,但由于受到经济体量较小的约束,其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②“亚洲四小虎”指的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

情形,其全球价值链形式也表现为依附性嵌入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但不同于小国经济,这种依附性嵌入模式对大国经济而言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大国的经济体量巨大,若没有自生的需求—供给循环,那么过度依赖外需的最终结果必然是经济结构加剧失衡。^①中国经济近年来所表现出的重大结构性失衡现象就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因此,中国作为典型的大国经济,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是参与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最优选择。^②

二、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特征

与中国经济过去所参与的全球价值链相比,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首先,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拥有自生能力。这种自生能力体现在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上,即由原动力与循环动力所构成的累积因果循环。其中,原动力是指国内市场效应所引致的现代部门在本国形成的产业集聚,循环动力是指现代部门的产业集聚又会反过来促进国内市场的增长。通过对这种基于国内市场有效需求形成的本土产业链良性循环的培育和利用,充分发挥市场差异化竞争和企业内生激励的重要作用,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经济能够在新型全球化中真正实现市场和技术的双重追赶。然而,这种双重追赶在过去那种依附性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是不可能成功的,一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从事的生产环节大多属于国际代工和贴牌生产,这就决定了这些本土代工厂很难获取边际成本之上的超额利润,更不用说与发达国家进行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的竞争,从而很难争夺(高附加值产品)市场份额;二是因为一个企业是否愿意进行自主创新,内生于企业自身的理性选择,在一定的市场环境和财务约束条件下,如果自主创新的风险和成本远远高于代工生产,那么企业就会理性地选择代工生产,因而难以实现自主技术创新。

其次,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强调动态竞争。在传统的分析框架下,根据全球价值链中的协调详尽程度和权力不对称程度的高低,治理结构被划分为层级型(hierarchy)、俘获型(captive)、关系型(relational)、模块型(modular)和市场型(market)五种组织模式,这从纵向视角解释了全球价值链上的供应—采购联系,其所关注的重点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如何参与到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市场并获取全球化红利,却未涉及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企业如何获得全球价值链主导权的问题。换句话说,传统的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忽略了全球价值链节点的动态控制与竞争这一重要内容。与此相对,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是从横向视角强调了企业在价值链不同增加值环节上竞争行为的动态性。特别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研发、设计、营销、售后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主要呈现为主动型治理结构,在物流采购、生产、分销等低附加值环节则主要呈现为被动型治理结构。^③在这种二元治理结构中,企业基于内需在国内市场中动态进入和退出,即通过协调机制和信息机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实现“突围”和“入围”的动态转换。因此,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横向治理有利于促进本土企业在动态竞争中实现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成长为隐形冠军企业或跨国大公司型的“链主”企业,从而突破原有价值链的低端锁定。

再次,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重视大国优势。大国内需构成了一个国家显著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市场的容量决定需求引致型创新的容量,二是国内市场的成长支撑“链主”企业的成长。更具体地说,国内市场的预期需求和细分市场的需求有利于催生产业发展的竞争力,国内市场需求规模和增长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竞争力^[1];而且,国内市场将通过各种优势的整合,逐渐成长

^①这当中的经济逻辑不难理解:若一个大国经济体的内需不强,那么长期在低端代工形成的巨大产能必然要依靠外需来消化,这在宏观上表现为大国经济体国内的经常账户顺差,国外的经常账户逆差。国外要维持逆差必然要借入大量外债,从而增加国际收支危机发生的风险,这种风险又会进一步传导回大国经济体国内,加剧产能过剩。

^②“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提出,可参见刘志彪(2012)^[10]。

^③主动型治理结构是指企业可以通过一系列专用性投资活动(如广告、研发、兼并等)影响市场的需求和供给条件;被动型治理结构是指企业只能在既定的市场需求和供给条件下进行经济活动。

为企业制定经营战略、发展核心产品、研发关键技术的基地,这也是企业走向全球化竞争的平台。正如Sturgeon指出的,一些标准和协议的规则制定过程往往就倾向于规则原创国^[12]。这些规则原创国又几乎都是拥有产业链核心主导权的大国,因而大国优势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实际上,斯密定理早就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规模越大,那么其市场与分工相互促进的螺旋增长效应就会越强。而且,在开放经济中,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由于有更多的企业专业化生产不同品牌产品,因而也会出口范围更广的产品,即拥有更大的贸易广度边际^[13]。大国市场优势并不仅仅局限在水平差异化产品上^①,它也可以拓展到品质不同的垂直差异化产品上。譬如,Schott研究发现,在同一种分类的出口产品中,富裕的大国比贫穷的小国拥有更高的出口单位价值^[14]。

最后,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拥有较长的产业链延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出口导向下依附性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但实际上,在这种全球价值链中,中国本土企业的产业链长度是极其有限的,典型地表现在:一是高端装备制造等制造业由于国内产业关联和循环的不足,导致研发、生产和销售体系全方位落后;二是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由于被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所排斥,其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严重受阻。显然,本土企业(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只能被锁定在“微笑曲线”的底部,缺乏产业链的关联性和延伸性,这就致使本土产业与本土市场之间形成巨大“裂缝”,进而导致本土产业创新动能的严重不足。相比较而言,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则拥有比较长的产业链延伸,能够引致更深程度的迂回生产和专业化分工。这是因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嵌入模式是既嵌入“蛛形”生产过程实现功能升级,同时又嵌入“蛇形”生产过程实现链条升级的网络型嵌入模式。^②从嵌入“蛛形”生产过程实现功能升级来看,以专业化市场为依托的本土产业集群是其最重要的空间和产业载体,它能够有效协调本土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并利用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的双边市场效应^③,向国内市场延伸产业链。从嵌入“蛇形”生产过程实现链条升级来看,其线性特点要求本土企业实现整个价值链的转换和重构,这意味着这些企业必须依靠大国内需市场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品牌市场能力以及与合约制造商的协调能力,进而发展成为全球价值链“金字塔”顶端的领导型企业。在这一过程中,本土企业能够主导全球价值链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从而极大地延伸全球价值链中的国内产业链。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即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的区别,这对于界定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和特征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近些年来,随着价值链理论研究的日益深入,国内价值链的概念引起了较多的关注。通常而言,一个开放经济体由国内市场循环和国外市场循环共同构成,且发达工业化大国(如美国)的经济变迁过程表明,两个循环的顺序一般表现为“先内后外”,也就是说,先在国内市场形成经济大循环后再向海外市场扩张。但中国经济由于是典型的转轨经济,在先易后难的渐进式改革策略选择下,直接跳过国内市场循环,借助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国外市场循环实现了快速增长。然而,依靠国外市场循环成长起来的中国经济没有足够的自生能力,致使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需持续疲弱的情况下,显现出增长乏力的不利态势。国内价值链概念的提出与中国经济增长的上述现实背景是较为契合的。不过,国内价值链虽然强调了国内市场循环的重要性,但其与全球价值链仍是被当作相互独立的对象来研究的,因而无法解决国内市场循环与国外市场循环的关联缺失问题。一些与国内价值链有关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在总体层面上是负相关的^[16],在空间区域

^①Krugman(1980)的国内市场效应的原理侧重于对水平差异化产品的分析^[5],即品质类似但品牌相异的产品。

^②“蛇形”(snakes)过程和“蛛形”(spiders)过程的概念来源于Baldwin and Venables^[15]对经济全球化中的外包和集聚的分析。“蛇形”生产过程代表了纵向维度上从上游的原材料投入到下游的最终产品产出所形成的一系列增加值环节;“蛛形”生产过程代表了横向维度上一系列的组装模块,集成了诸多部件,但不同模块之间存在生产技术层次的差异。

^③这种双边市场效应表现为:在卖方市场上,专业化市场中的企业既可以选择国外采购商也可以选择国内采购商,从而避免被国际大买家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环节;在买方市场上,专业化市场中的企业则可以利用多样化的国内需求,进行一定程度的自主研发和品牌创造。

层面也表现为沿海地区与美日发达国家的增加值供求关系最为紧密^[17]。与此不同,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特征表明,其有利于将国内市场循环和国外市场循环有机结合,进而化解内需和出口之间的结构性背离。因此,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并非是国内价值链的同义变换,从某种程度上讲,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是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综合。

三、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政策启示

纵观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无一不是充分利用了国内市场需求,激发内需与产业之间的良好互动,进而依靠跨国公司将这种竞争优势向海外市场延伸和渗透的,其牢牢控制着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形成并巩固作为全球价值链“链主”的地位。然而,中国虽然也有着巨大的内需潜力,但参与全球化分工的方式却表现为出口导向下的国际代工,逐渐形成了对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依附性嵌入,这又反过来导致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进一步分离,从而陷入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比较优势陷阱。因此,中国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政策启示是:摒弃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全价值链依附性嵌入^①,转而在需求联系的国内产业链循环中,促进企业以动态比较优势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实现市场和技术的双重追赶。这需要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协同发力。

首先,从微观层面看,应重视培育和企业家精神。从学理上讲,企业家的诞生是劳动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但不同于显性的体力劳动,企业家精神更多地表现为隐性的知识劳动,与哈耶克^[18]所说的“知识分工”(division of knowledge)不谋而合,如企业家发明一种新技术生产新产品或改造旧产品,利用新的产品渠道进行市场销售,甚至于对所在行业进行兼并重组等。显然,企业家精神是构成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因为企业家在认知能力、发现能力、利用市场机会的能力、协调专业化知识的能力等方面均具有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促使企业家不断尝试新构造和新要素的组合以优化资源配置,进而获得领先于竞争对手的技术与市场优势^[19]。对于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而言,企业家精神是推进全球价值链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的最重要的微观动力。^②

其次,从中观层面看,应注重维护国内市场的产业平等竞争。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行为必然受到所在国市场结构的影响。根据Dunning and Lundan的观点,市场结构刻画了相似价值链中产业竞争的范围和特征^[21]。因此,市场结构主要通过包括集中度、进入和退出等在内的竞争效应影响市场绩效。理论上讲,市场盈利强调产业竞争的不完全性,因为完全竞争的情形不仅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而且完全竞争情形意味着所有企业的规模和数量是既定的,也就不存在竞争。如果这种竞争不完全性源于市场不确定性、规模经济等市场因素,那么一定程度的产业集中和进入壁垒,不仅决定了在不引起新进入者进入的条件下可以维持的市场最高价格,而且也决定了现存企业之间避免过度价格竞争以实现合作的可能性,从而有利于企业乃至产业整体盈利能力的提升。但是,如果竞争不完全性源于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的结构性扭曲,那么国内市场的产业竞争效率就会遭到极大的破坏。过去长期以来,受传统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影响,中国民营经济所遭受的不平等竞争就表明了这一点。民营企业是中国制造业的主体,但其在国内市场的竞争条件却很是不平等,表现在税费负担、融资条件、享受的公共服务、政策歧视等方面。不可否认,这种不平等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中国经济过去的非均衡增长,然而,非均衡增长也伴随着严重的结构失衡,该模式已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不平等竞争只会加剧结构失衡,对于产业创新和升级极其不利。中国高铁的成功经验也表明,由若干家竞争性企业所形成的“可控制的

^①全球价值链中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先验地假定了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拥有技术创新优势,而被动嵌入者则要么拥有原材料资源优势、要么拥有廉价劳动要素优势,这一假定直接消除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利用巨大内需市场发展国家竞争优势的可能性,而动态比较优势基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条件,表明比较优势是经济结构变迁过程中的内生结果。

^②Humphrey and Schmitz系统性地分析了全球价值链的四种升级方式,依次为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20],但在全球价值链的依附性嵌入模式下,本土产业往往只能实现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

竞争”市场结构,有助于提高竞争的动态效率^[22]。

最后,从宏观层面看,应不断优化政府的经济治理体系。在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构建过程中,也不能忽视政府扮演的重要角色。正如La11指出的,政府是否干涉技术能力和竞争优势的发展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干涉其过程^[23]。这就是说,国家竞争优势需要从低级生产要素导向转型到高级生产要素导向,但政府不能一味地强调补贴、保护等,而是应该更多地引导“钻石体系”中的关键要素发展,扮演信息提供者、竞争维护者等公共服务型角色^[11]。对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而言,政府角色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为通过高质量的制度供给,依序扩大内需规模和优化内需结构,进而拉动本土产业链的创新升级。譬如,一方面,在“蛛形”过程的嵌入中,一旦以专业化市场为依托的产业集群经过自然演化而初见雏形,那么政府就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进行强化^①;另一方面,在“蛇形”过程的嵌入中,政府可以通过培育先进而挑剔的领先用户以优化内需结构,从而降低企业进行新产品开发时对缺乏市场需求的风险预期。

四、总结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构筑起来的外向型全球化分工网络体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性的重构,但这也为中国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提供了重要的产业基础条件。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是基于对国内市场需求潜能的充分开发和利用,建立起的“以我为主”的全球化产业分工组织机制。譬如,中国高铁的创新过程就可以理解为在国内市场的巨大运输需求的拉动作用下,将内需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进而实现自主可控、创新驱动的产业体系构筑过程,而且在国内市场效应的作用下,中国高铁也实现了向海外市场的输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拥有自生能力、强调动态竞争、重视大国优势和较长的产业链延伸,这些基本特征进一步表明,内需与出口的结构背离能够在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中得到有效化解。

最后需要指出,本文虽然从理论角度重点分析了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内涵、基本特征以及政策启示。但限于篇幅,仍有一些重要议题未能详细展开,比如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分析,涉及基于国内市场需求的原动力和基于本地知识溢出的循环动力所构成的累积因果循环原理;又如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分析,涉及本土企业在国内主导型全球价值链中基于产品差异化和企业内生激励进行动态竞争的微观机制;再如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实现路径分析,涉及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在实践中的理论和实证依据。这些重要议题唯有留待后续做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江小涓. 大国双引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内需和外需[J].管理世界,2010,(6):1-7.
- [2]凌永辉,刘志彪. 中国服务业发展的轨迹、逻辑与战略转变——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分析[J].经济学家,2018,(7):45-54.
- [3]陈家勤. 关于外向型经济问题讨论综述[J].中国社会科学,1989,(3):110-120.
- [4]李慧中. 内需:不是对外需的替代而是支持——兼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J].探索与争鸣,2013,(2):64-68.
- [5]KRUGMAN P.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 70(5): 950-959.
- [6]贾根良. 美国经济崛起时期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与启示[J].教学与研究,2011,(8):53-60.
- [7]ANTRÀS P. Conceptual Aspects of Global Value Chains[R].NBER Working Paper, w26539, 2019.
- [8]谭崇台. 应该重视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欧阳晓等著《大国经济发展理论》评介[J].经济研究,2014,(6):189-

^①需要强调的是,政府不能随意地建立产业集群,因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市场经济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自然演化的结果,只有在产业集群开始成型之后,政府才能发挥作用。

192.

[9]黄琪轩. 大国经济成长模式及其国际政治后果——海外贸易、国内市场与权力转移[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 (9): 107-130+159-160.

[10]刘志彪. 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 中国分享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战略选择[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12, (2): 51-59+159.

[11]PORTER M 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12]STURGEON T J. What Really Goes on in Silicon Valley? Spatial Clustering and Dispersal in 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3, 3(2): 199-225.

[13]HUMMELS D, KLENOW P J. The Variety and Quality of a Nation's Expor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3): 704-723.

[14]SCHOTT P K. Across-Product versus Within-Product Speci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4, 119(2): 647-678.

[15]BALDWIN R, VENABLES A J. Spiders and Snakes: Offshoring and Agglomer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3, 90(2): 245-254.

[16]张少军, 刘志彪. 国内价值链是否对接了全球价值链——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经验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13, (2): 14-27.

[17]潘文卿, 李跟强. 中国区域的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 区域互动与增值收益[J]. 经济研究, 2018, (3): 171-186.

[18]VON HAYEK F A. Economics and Knowledge[J]. Economica, 1937, 4(13): 33-54.

[19]HENDERSON R M, CLARK K B. Architectural Innovation: The Reconfiguration of Existing[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 35(1): 9-30.

[20]HUMPHREY J, SCHMITZ H. 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 [J]. Regional Studies, 2002, 36(9): 1017-1027.

[21]DUNNING J H, LUNDAN S M.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M].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8.

[22]贺俊, 吕铁, 黄阳华, 江鸿. 技术赶超的激励结构与能力积累: 中国高铁经验及其政策启示[J]. 管理世界, 2018, (10): 191-207.

[23]LALL S. Linking FDI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or Capacity Building and Strategic Competitiveness[J].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2002, 11(3): 39-88.

(收稿日期: 2020—04—09 责任编辑: 肖磊)

The Concepts,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Domestic Demand Oriented Global Value Chains Ling Yong-hui, Liu Zhi-biao

Abstract: China's dependency embedding pattern of 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under export-oriented strategy is a rational choice in the context of "dual weakness" in domestic supply and demand, which, however, has caused a structural divergence between domestic demand and exports, resulting in local companies being locked in the low value-added segment of GVCs. The key mechanism to resolve this structural divergence problem is to build the domestic demand oriented GVCs based on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at is, relying on the effective demand of the domestic market to establish a kind of "own initiative oriented" global industrial division mechanism.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domestic demand oriented GVC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ur aspects: viability, dynamic competition, big country advantage and longer industrial chain extension. To build the domestic demand oriented GVCs, China needs to cultivate and maintain entrepreneurship at the micro level, maintain equal competition for industries at the meso level, and optimize the government's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at the macro level.

Key Words: Domestic Demand Oriented; Global Value Chains; Big Country Advantage; Globalization